

DONGFANG DAODE YANJIU

东方道德研究

(第十辑)

王新宏 主编
王颖 副主编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第十辑

东方道德研究

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

王新宏 主 编

王 颖 副主编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方道德研究 / 王新宏主编. —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 2009. 2

ISBN 978 - 7 - 80249 - 146 - 5

I. 东… II. 王… III. 道德 - 东方国家 - 文集 IV. B8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1604 号

东方道德研究 (第十辑)

主 编: 王新宏

副 主 编: 王 颖

责任编辑: 刘向鸿 刘伟娜

装帧设计: 阿 正

责任审读: 肖海林

责任印制: 张 萍

出版发行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北京宝隆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mm × 1168 mm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8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49 - 146 - 5/Z · 008

定 价: 28.00 元

服务热线: 010 - 58301130

销售热线: 010 - 58302813

地址邮编: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 - 20
层, 100044

<http://www.chgslcbs.cn>

E - mail: cicap1202@sina.com (营销中心)

E - mail: gslzbs@sina.com (总编室)

工商联版图书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
请与印务部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10 - 58302915

《东方道德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:罗国杰

主 编:王新宏

副主编:王 颖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永炳[新加坡]

王 敏[日本]

王殿卿

王新宏

王 颖

巴信城[中国台湾]

叶瑞昕

甘葆露

刘国强[中国香港]

任文利

张晓华

杨庆中

赵骏河[韩国]

赵雁侠

席 瑜[中国台湾]

顾乐士[美国]

梁燕城[加拿大]

谭绍兵

秘 书:王文影

目 录

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

- “国学”若干问题浅议 黄 钊(3)
- 论儿童“读经”的必要与可能 陈 升(16)
- 文化的批判与文化的传承 浦卫忠(32)
- 文化自觉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于建福(42)

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

- “孝”乃天下和谐之源 王殿卿(69)
- 试析传统“孝”的内容及特点 赵军华 白精卫(79)
- 解读孔子的忠恕之道 任文利(88)
- 析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王 颖(98)

传统节日文化研究

- 对传统节日的崇拜、热爱及别样心情 张晓华(113)
- 阴阳协和:清明文化的内在意蕴 叶瑞昕(118)

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

- 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加强诚信建设的反思 黄秀清(127)
- 浅议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王新宏(136)
- 论传统孝道的现代功能 谭绍兵(149)

海外儒学研究

弗兰克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儒学的汇流 刘国强(159)

儒学普及与实践

儒学普及工作的经验与展望

——在第二届儒学普及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张 践(173)

引入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教育改造工作 张 发(183)

党校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 王 杰(194)

工科院校开展儒学教育的探索和实践

——以浙江科技学院儒学教育为例 ... 杜 卫 陶绍清(198)

亲近圣贤 净化心灵 服务社会

——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国学教育模式探索 ... 宋 婕(206)

实施写字教育 传承中华美德 雷文宇(214)

儒家经典师资读书班学员学习心得

读《论语》体会孔子的教学思想 张文海(225)

浅议儒家经典与现代德育

——以《论语》中传统美德进行学校德育的几点思考

..... 边 红(232)

读《论语》“不迁怒”有感 蔡晓辉(240)

成人之美之《论语》

——读《论语》有感 任国红(244)

编后记 (248)

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

“国学”若干问题浅议

黄 钊

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入,一股“国学”热潮正在兴起。我们为这股热潮的到来,拍手叫好。那么,什么叫“国学”?如何把握“国学”的“源”与“流”?“国学”有什么样的现代价值?怎样才能完成复兴“国学”的大任?本文想就这些问题,谈一点个人的肤浅体会,以就教于海内外“国学”方家。

一、“国学”的内涵

“国学”的提出,不是偶然的,它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“西学东渐”的文化潮流日益高涨的产物。当时的学者,为了把中国之学同西方之学区别开来,便创造出“国学”这一概念,旨在与“西学”相对应。所以“国学”亦有人称之为“中学”或“汉学”。

“国学”提出后,对它的内涵,学术界见仁见智,众说纷纭。笔者以为,“国学”乃“国人之学”的简称。这里的“国人”,指中国人;“学”,指学术或学问。故“国学”,即中国人之学术、学问。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《国学今论·序》中,直截了当地说:“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。”这是非常恰当的。

“国学”,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特有概念,它仅指中国之

学术,而不用来指外国的学术。有人将“国学”泛化,使之变为泛指世界各国自己的学术,如邓实就是一例。他给“国学”下了这样的定义:“国学者何?一国所自有之学也。有地而人生其上,因以成国焉。有其国者有其学,学也者,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,而自治其一国者也。国学者,与有国而俱来,因乎地理,根乎民性,而不可须臾离也。”(《国粹学报》第19期《国学讲习记》)邓氏在这里将“国学”泛化,按照他的定义,美国有美国的“国学”,英国有英国的“国学”,而中国之“国学”,只是世界各种不同“国学”之一种。显然,他的定义没有肯定“国学”是中国之学术,因而同我们所讲的“国学”,内涵与外延均不一致,故不可取。

由于“国学”与“国故”相关,故有人又主张将“国故”称之为“国学”,例如,章太炎著《国故论衡》,就将“国故”等同于“国学”。但“国故”是死的,而“国学”是活的,因而以“国故”代“国学”,并不恰当。后来,又有人在“国故”后面加一“学”字,称为“国故学”。例如,胡适曾说:“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,只是‘国故学’的缩写。”(《国学季刊》之《发刊词宣言》)曹聚仁倾向这一说法,对“国学”下了这样的定义:“国学者,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,用合理的、组织的、系统的方式载其生灭,分析其性质,罗列其表现形式,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。简言之,国学者,以我国固有之学术为研究之对象,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,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。”(见曹聚仁《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》)曹氏在这里从繁、简两个层面,对“国学”所下的定义,都是把“国学”视为“国故学”。其实,这个说法也不恰当。因为,“国学”是一种开放的体系,它并非仅是“国故”之学,还必须同发展着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相融合。离开了时代精神,离开了社会实践,“国学”就必然丧失其生命力。因此,我们不能把“国学”简单等同于“国故学”。

“国学”同“中国传统文化”关系紧密。时下,有人把“国学”说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其实,这个说法也不确切。我们知道,“国

学”同“中国传统文化”在概念上有明显的差异。“中国传统文化”，包括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，而“国学”只是传统的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（并非全部，因为其中还有不属于“学”的精神文化）。笔者以为，中国传统文化，可以算作国学的载体，国学正是伴同传统文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的。所以，我们讲到“国学”，就必须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。离开了传统文化，就很难讨论“国学”。

既然“国学”是中国人之学术，那么，它包括哪些内容呢？对此，张岱年先生也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，他指出：“总起来说，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、经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政治学、军事学、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…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。”（《国学今论·序》）张先生的这个概括比较全面、稳实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从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看，人们所谈的“国学”，似乎较多涉及人文科学，特别是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政治学等。我个人的注意力，也是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。

二、“国学”的“源”与“流”

“国学”有自己的“源”与“流”。把握“国学”的“源”与“流”，对于全面认识“国学”的历史轨迹及其历史功能与现代价值，至关重要。

首先，关于“国学”之“源”。“国学”源头深远，可以说它同中华民族的兴起同步，有着上下数千年的发展史，是我们民族文明进步的结晶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最早的国学思潮，乃发生在春秋战国“百家争鸣”时期。“百家争鸣”，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，它奠定了“国学”的根基。“国学”的源头，当然还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发生的炎帝、黄帝时代乃至更古远的文明初兴时期，但我们认为，作为“中国人的学术”之国学，其直接源头，当可以从“百家争

鸣”时期的诸子之学算起。

中国历史上的“百家争鸣”，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。它的出现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当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。春秋战国之际，奴隶制正在走向崩溃，封建制正在兴起。当时，“诸侯异政”，在思想上导致了“百家异说”，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种种分歧。这些分歧，促成了“百家争鸣”学术思潮的出现。这里说的“百家”，是一个约数，泛指当时学派之众，并非真有“百家”。当时比较著名的学派，汉代人司马谈将之归为“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”六家；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又在六家基础上，增加纵横家、小说家、农家、杂家，称为“十家”；在十家中，略去“小说家”，即称之为“九流”。无论是“九流”或“十家”，都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争鸣的大势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说（术）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”可见，“百家争鸣”在客观上反映了先秦诸子在学术上“蜂出并作”的盛况。

在先秦的“九流”或“十家”中，最有学术影响的学派，只有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。这四家都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，且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。这四大学派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一方面，努力宣传自己的学术见解；另一方面，又在学术上与其他学派相对撞，以至出现了儒、墨、道、法诸家彼此碰撞、论辩、交锋的学术争鸣盛况。这种学术争鸣环境，在既互黜又互补的大潮中展开，如同大浪淘沙，使各家各派经受洗礼和锻炼，从而逐渐走向成熟。据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春秋战国之际的“百家争鸣”，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空前繁荣的学术思潮。在这一思潮中，先秦诸子所创造的学术成果，对尔后中国学术的演进发展，产生了根本性的学术影响。先秦以降，中国学术虽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在不断变化发展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我们总是可以从先秦诸子学说中找到思想源头，或曰找

到产生新思想的“种子”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把先秦诸子之学,看做“国学”之“源”。我们要把握“国学”,必须从源头上下工夫,也就是说,必须把探索的触角伸入到先秦“诸子”之学中,看先秦诸子是怎样为“国学”在后代的繁荣发展,铺垫出深厚的学术根基的。

其次,关于“国学”之“流”。“国学”形成后,有着自己的特定流向。从秦汉到明、清,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历史。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,思想家们(特别是儒家学者、道家学者以及后来的佛教学者)以“论道经邦”为己任,在“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、成一家之言”的学术实践中,创造出形态各异、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成果,从而大大深化提高了“国学”的水平。如果说,先秦诸子之学,是“国学”兴起的活水源头;那么,先秦以降,儒、道、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,则构成了“国学”发展的三大干流。

这三大干流,奔腾向前,相互激荡,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,如汉初黄老思潮、两汉尊儒思潮、东汉反神学思潮、汉魏道教思潮、魏晋玄学思潮、隋唐佛学思潮、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,等等,组合成“国学”发展演变的宏伟画面。这八大思潮,前后相继,表现形式和展示内容各不相同,但是,它们都同儒、道、佛三家学术紧密相关,或表现为三家中之一家的思维向路,或表现为三家中之两家或三家的思想会通,从而分别从不同视角、不同层面展示了国学发展演变的基本流向。

“国学”在演变发展中,有其丰富内涵,表现出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。其中,有进步的思想理念,也夹着落后的或封建的社会意识。尽管如此,从总体上看,可以说,它总是同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大势相协调,总是服务和服从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,并且总是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迈向新的目标。从这些来看,“国学”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中,确实举足轻重。它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、价值观念、道德取向、社会风气以及人民群众

的人文素质,产生过极端重要的影响,并且还将继续产生这些影响。对此,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。

三、“国学”的现代价值

如何评价“国学”,在历史上有两种错误倾向:一派是国粹派,夸大“国学”或“中学”的功能,以达到排斥西学的目的;另一派是民族虚无主义者,把“国学”说得一无是处,以达到他们“全盘西化”的目的。所以,如何看待“国学”,的确不是简单的问题,它反映了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认识上或立场上的问题。因此,引导人们正确认识“国学”的价值,特别是现实价值,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“国学”到了今天,无疑仍有自己的现实价值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: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,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以总结,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,是有重要的帮助的。”(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)毛泽东在60年前的这段论述,实质上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(包括“国学”)的现代价值。因为,如果传统文化没有价值,则他强调“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”,就是无的放矢了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“十七大报告”中亦指出:“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。”他强调,要“弘扬中华文化,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”。“国学”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,当然也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”,也能在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”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这都有力地证明,“国学”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,确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,对此,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。

那么,到了今天,我们弘扬国学,究竟还有哪些重大价值呢?

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并非用简短的文字所能说清楚的。因为,作为一种文化价值,它有多方面的内涵,且对于探索者来说,又往往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看法各不相同。这里仅就本人的点滴认识,提出以下几个方面,与关心这一问题的同人共同讨论。

第一,弘扬“国学”,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我们正在加紧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,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不仅体现在政治、经济方面,也体现在文化方面。没有文化方面的复兴,政治与经济的复兴,就是一句空话。而要实现文化方面的复兴,就不能不复兴“国学”。诚然,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,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,离开了马克思主义,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将失去方向,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化上的复兴。但是,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,这个“马克思主义”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,必须同中国的文化相融合,必须完成“本土化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不能不从“国学”中吸取营养,就不能不在复兴“国学”上下工夫。“国学”,作为中国本土的学术,它集中反映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,总结了本民族的文化创造,传承着本民族的道德理念,昭示着本民族的价值取向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,必须同本民族的思维方式、文化创造、道德理念、价值取向相会通。因此,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,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,就必须发挥国学的既定优势,让“国学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,发挥如同胡锦涛同志所说的“不竭动力”的重要作用。所以,弘扬“国学”,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,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价值。

第二,弘扬“国学”,有助于传播中华民族精神。中华民族在文明进步中,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。这些民族精神的产生,都同“国学”的创造性贡献不可分割。例如,人们常说的“自强不息”的积极进取精神、“厚德载物”的宽厚

包容精神、“天下为公”的爱国奉献精神、“克勤克俭”的勤劳俭朴精神、“见利思义”的以义制利精神、“仁者爱人”的博爱大众精神、“和而不同”的尚中贵和精神、“持守气节”的人格独立精神、“明法审令”的依法治国精神、“唯道是从”的尊奉大道精神,等等,都是“国学”先哲大力提倡的优秀民族精神。可以说,没有“国学”,就不可能产生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民族精神。这些精神,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,都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。江泽民同志曾指出:“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,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。综合国力,主要是经济实力、技术实力,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,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、民族凝聚力,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,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。”^①又说:“这个民族精神,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,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、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。”^②由此可见,我们要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,不能不用力传播中华民族精神。而要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精神,又不能不在复兴“国学”上下工夫。因为,“民族精神”,说到底还是“国学”结出的硕果,它蕴涵于“国学”之中。如果“国学”不能得到复兴,则传播民族精神就是一句空话。

第三,弘扬“国学”,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,是党中央既定的伟大战略任务。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明确指出:“建设和谐文化,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。”而要建设和谐文化,就必须大力弘扬“国学”。这是因为,中国和谐文化的源头,乃深藏于“国学”之中。人所共知,我们的先哲,一向强调“中和”观念,无

① 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》,第395页,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2。

② 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》,第395页,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2。

论是儒家提出的“执两用中”、“过犹不及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和为贵”(以上均为孔子语)、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(《中庸》)的和谐哲理;还是道家强调的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(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)、“和乃生,不和不生”(《管子·内业》)、“和天下,泽及百姓”(《庄子·天下》)、“与人和,谓之人乐;与天和,谓之天乐”(《庄子·天道》)的尚和意识,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“国学”先哲“尚中贵和”的思想追求。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文化,必须发掘“国学”先哲留给我们的有关中和之道的思想遗产,并结合当前的时代需要,与时俱进地将之推向前进。因此,弘扬“国学”将有助于推进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。

第四,弘扬“国学”,有助于推进现代企业管理。讲弘扬“国学”,有助于推进现代企业管理,有的人也许不理解,他们甚至会说:“国学”是传统的东西,而现代企业管理是全新的东西,两者差距很大,怎么可能联系起来呢?这个说法,是只看到表面现象,而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。从本质上说,把“国学”同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,就是促进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化。应当看到,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“国学”,内含无比高深的人文智慧,将它应用于企业管理,将会促使这些智慧大放光彩。如,中国古代的“儒商”,他们既懂儒家伦理,又懂经营之道,能把儒家的“诚信”说、“义利”说、“仁爱”说等富有人文内涵的思想成果用于经商,常常能取得很大的成功。这一点,连日本、朝鲜等海外企业界也不否认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,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,被称为“日本近代企业之父”,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,深有体会地说:“我们经营中虽饱含辛苦和惨淡,但常遵孔子之教,据《论语》之旨,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。”不仅儒家学说有利于优化经营之道,其他各家也都有自己的长处所在。如兵家之说,就不可忽视。在市场经营中,商场就是战场,面对这种情况,《孙子兵法》常常能为我所用。又如,企业竞争,常常面临以弱对强的局面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道家“柔弱胜